

# 论钟嵘《诗品》的目录学渊源

胡大雷

钟嵘《诗品》另有“诗评”之名，实与其学术渊源有关。《文章志》一类“叙文士之生平”，“论辞章之端委”，“辨其流别”，记其书名，属于对作品整体关注的评价。钟嵘的撰述当依《文章志》而来，其学术渊源为目录学，钟嵘所师承者即目录学家王俭。按照章学诚提出的“互著”体例，钟嵘之作应著录于“簿录篇”，又著录于“总集”类。钟嵘作《诗品》标榜目录学的心理动因，在于防止“随其嗜欲，商榷不同”之类问题，意欲把文学批评学术化。

## 一、《诗品》与目录学

钟嵘《诗品》《隋书·经籍四》著录：“《诗评》三卷，钟嵘撰，或曰《诗品》。”<sup>①</sup>《梁书·钟嵘传》云：“嵘尝品古今五言诗，论其优劣，名为《诗评》。”<sup>②</sup>《南史·钟嵘传》云：“嵘品古今诗为评，言其优劣。”<sup>③</sup>或曰“评”与“品”，义本两通，但笔者认为，看似所谓《诗品》或《诗评》的书名之争，实则涉及该书究竟是什么性质。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诗话》论《诗品》有云：“《文心》体大而虑周，《诗品》思深而意远，盖《文心》笼罩群言，而《诗品》深从六艺溯流别也（如云某人之诗，其源出于某家之类，最为有本之学。其法出于刘向父子）。论诗论文，而知溯流别，则可以探源经籍，而进窥天地之纯、古人之大体矣。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。”<sup>④</sup>《诗品》论诗有“其源出于某某”之类的推源溯流，章学诚认为“出于刘向父子”，即认为《诗品》有目录学渊源，基于此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究钟嵘《诗品》的总体性渊源是什么，即从钟嵘的学术渊源来探讨其书名当是《诗品》还是《诗评》。

钟嵘在《诗品序》中对挚虞《文章志》评价很高，称“挚虞《文志》，详而博赡，颇曰知言”<sup>⑤</sup>。挚虞《文章志》的学术渊源是什么？这一类书著录于《隋书·经籍二》的“簿录篇”，“簿录篇”所著录的书大都标明为“某某目录”，属于目录书无疑。先看“簿录篇”对《文章志》一类书的著录：“《七

略别录》二十卷(刘向撰)《七略》七卷(刘歆撰)《晋中经》十四卷(荀勖撰)……(标明为“某某目录”书两种)《今书七志》七十卷(王俭撰)……(标明为“某某目录”书三种)《七录》十二卷(阮孝绪撰)……(标明为“某某目录”书十一种)《杂撰文章家集叙》十卷(荀勖撰)《文章志》四卷(挚虞撰)《续文章志》二卷(傅亮撰)《晋江左文章志》三卷(宋明帝撰)《宋世文章志》二卷(沈约撰)。”<sup>⑥</sup>《文章志》一类书与标明为“某某目录”的书性质一样,当都属于目录书。《隋书·经籍二》亦强调“簿录篇”的目录书性质,其小序有云:“古者史官既司典籍,盖有目录,以为纲纪,体制堙灭,不可复知。孔子删书,别为之序,各陈作者所由。韩、毛二《诗》,亦皆相类。汉时刘向《别录》、刘歆《七略》,剖析条流,各有其部,推寻事迹,疑则古之制也。自是之后,不能辨其流别,但记书名而已。博览之士,疾其浑漫,故王俭作《七志》,阮孝绪作《七录》,并皆别行。大体虽准向、歆,而远不逮矣。其先代目录,亦多散亡。今总其见存,编为簿录篇。”<sup>⑦</sup>由此可见,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认为《文章志》一类书是目录书。郑樵以及后世郭绍虞、姚名达、王重民、兴膳宏等学者有关《文章志》为“文章目录”的判断,自不能轻易否定。

章学诚《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》有云:“晋挚虞创为《文章志》,叙文士之生平,论辞章之端委。”<sup>⑧</sup>刘师培《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》谓《文章志》云:“文学史者,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。古代之书,莫备于晋之挚虞。虞之所作,一曰《文章志》,一曰《文章流别》。志者,以人为纲者也;流别者,以文体为纲者也。”<sup>⑨</sup>这就是说《文章志》是“以人为纲”的文学史。《文章志》一类书的体例,当是“叙文士之生平”以及“辨其流别”,即“论辞章之端委”等。

挚虞《文章志》与荀勖《文章叙录》以后的同类书,多有对作品实施评价者,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第67则注:“顾恺之《晋文章记》曰:阮籍《劝进》,落落有宏致,至转说徐而撮之也。”<sup>⑩</sup>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第84则注:“《续文章志》曰:〔潘〕岳为文选言简章,清绮绝伦。”<sup>⑪</sup>同则又注:“《文章传》曰:〔陆〕机善属文,司空张华见其文章,篇篇称善,犹讥其作文大治。谓曰:‘人之作文,患于不才,至子为文,乃患太多也。’”<sup>⑫</sup>《文选》卷一二《海赋》“木玄虚”下李善注:“《今书七志》曰:木华,字玄虚,《华集》曰:为杨骏府主簿。傅亮《文章志》曰:广川木玄虚为《海赋》,文甚隽丽,足继前良。”<sup>⑬</sup>

又有对作者文学事迹整体关注者,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第98则注:“宋明帝《文章志》曰:桓温云:‘顾长康体中痴黠各半,合而论之,正平平耳。’世云有三绝:画绝、文绝、痴绝。”<sup>⑭</sup>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第29则注:“按宋明帝《文章志》曰:〔谢〕安能作洛下书生咏,而少有鼻疾,语音浊。后名流多学其咏,弗能及,手掩鼻而吟焉。桓温止新亭,大陈兵卫,呼〔谢〕安及〔王〕坦之,欲于坐害之。王入失措,倒执手版,汗流沾衣。安神姿举动,不异于常。”<sup>⑮</sup>

从上引者可知,《文章志》一类书的体例,除“文章目录”外,又“叙文士之生平”以及“辨其流别”,即“论辞章之端委”;另外,就是对作品整体关注的评价。钟嵘《诗品》著述体例并无二致,如上品“宋临川太守谢灵运”一则:“其源出于陈思,杂有景阳之体。故尚巧似,而逸荡过之,颇以繁芜为累。嵘谓:若人学多才博,寓目辄书,内无乏思,外无遗物,其繁富宜哉!然名章迥句,处处间起,丽曲新声,络绎奔发。譬犹青松之拔灌木,白玉之映尘沙,未足贬其高洁也。初,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,是夕,即灵运生于会稽。旬日而谢安亡。其家以子孙难得,送灵运于杜治养之。十五方还都,故名‘客儿’。”<sup>⑯</sup>这与《文章志》的体例基本相合。《诗品》以所著录诗人的“五言诗”为基准,其《序》对历代诗人进行批评时,于诸家皆有所贬斥,惟独对挚虞之作赞誉有加,竟无微词,亦可明其渊源有自。

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七略》有云:“至成帝时,以书颇散亡,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。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,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,太史令尹咸校数术,侍医李柱国

校方技。每一书已,辄条其篇目,撮其指意,录而奏之。会向卒,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。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,故有《辑略》,有《六艺略》,有《诸子略》,有《诗赋略》,有《兵书略》,有《术数略》,有《方技略》。”<sup>①</sup>《诗品序》云:“昔九品论人,《七略》裁士,校以宾实,诚多未值。至若诗之为技,较尔可知。以类推之,殆均博弈。”<sup>②</sup>杨明称:“钟嵘之意,盖谓其人其书被著录于《七略》者,便有才士之目,犹如《中品序》所谓‘预此宗流者,便称才子’。”<sup>③</sup>钟嵘之意,即欲以目录学书《七略》为榜样作文学批评。

《隋书·经籍一》著录《七略》有云:“每一书就(刘)向辄撰为一录,论其指归,辨其讹谬,叙而奏之。”<sup>④</sup>章学诚《校雠通义》云:“校雠之义,盖自刘向父子,部次条别,将以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。”<sup>⑤</sup>钟嵘在《诗品序》亦称自己的工作为“辨彰清浊,掇摭病利”<sup>⑥</sup>。余嘉锡云:“目录之书有三类: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,书名之下有解题者;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;三曰小序解题并无,只著书名者。”<sup>⑦</sup>今通行本《诗品》书前的序,在某些版本中就是分置于上、中、下品之间的,当可视为“部类之后有小序”的,而“书名之下有解题者”,则视为对所著录诗人的品评。显然,《诗品》具有目录学书的性质。另外,《诗品》论诗有“其源出于某某”之类的推源溯流,章学诚认为是“出于刘向父子”,更是目录学的作法。

## 二、钟嵘的师承

我们再来看钟嵘的师承。《诗品下》称王俭:“至如王师文宪,既经国图远,或忽是雕虫。”<sup>⑧</sup>王俭,谥文宪。《南史·钟嵘传》:“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,明《周易》。卫将军王俭领祭酒,颇赏接之。”<sup>⑨</sup>这位被钟嵘尊称为“师”的王俭,在我国传统目录学史上是一位有杰出贡献的人物。《南齐书·王俭传》云:“王俭,字仲宝,琅琊临沂人也……解褐秘书郎,太子舍人,超迁秘书丞。上表求校坟籍,依《七略》撰《七志》四十卷,上表献之,表辞甚典。又撰定《元徽四部书目》……是岁(永明三年),省总明观,于俭宅开学士馆,悉以四部书充俭家,又诏俭以家为府。四年,以本官领吏部。俭长礼学,谙究朝仪,每博议,证引先儒,罕有其例。八坐丞郎,无能异者。令史咨事,宾客满席,俭应接铨序,傍无留滞。十日一还学,监试诸生,巾卷在庭,剑卫令史仪容甚盛。”<sup>⑩</sup>《隋书·经籍一》谓王俭有云:“元徽元年,秘书丞王俭又造《目录》,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。俭又别撰《七志》:一曰《经典志》,纪六艺、小学、史记、杂传;二曰《诸子志》,纪今古诸子;三曰《文翰志》,纪诗赋;四曰《军书志》,纪兵书;五曰《阴阳志》,纪阴阳图纬;六曰《术艺志》,纪方技;七曰《图谱志》,纪地域及图书。其道、佛附见,合九条。”<sup>⑪</sup>钟嵘尊称王俭为“师”,王俭对钟嵘“颇赏接之”,那么,钟嵘的《诗品》或《诗评》撰述,是否受到王俭“撰定《元徽四部书目》”的影响?其《诗品》或《诗评》,是否在王俭宅之学士馆完成?是否利用了王俭宅学士馆的“四部书”?颇值得探讨。

东汉桓帝时初置秘书监,秩六百石。《后汉书·马融传》有“典校秘书”之语,盖古代图书集中帝室,西汉时藏于天禄阁,东汉时藏于东观,故谓之秘书。亦以东汉崇尚讖纬,故取秘密之意。只有魏武帝时之秘书令,实已改为机要之职,后乃改称中书令,而以秘书令仍为监,掌艺文图籍之事。秘书监在魏、晋专掌艺文图籍之事,南朝梁时始独立成一省。魏、晋以后秘书监之官名即其机构之名,晋代之秘书监所领有著作局。梁始专设秘书省,置监及丞各一人,秘书郎四人。晋以后秘书郎一职属秘书监。南朝贵族子弟初仕多以此为美官,故当时有“上车不落则著作,体中何如则秘书”之语,可见徒有其名而不任事。唐制以秘书郎分掌四部书(经、史、子、集),分判校写。在秘书监任职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典校图籍,典校图籍的成果就是编撰目录,

即《南史·殷钧传》载,殷钧“历秘书丞,在职启校定秘阁四部书,更为目录”<sup>②</sup>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列撰写过《文章志》一类书的作者,如荀勖、挚虞、傅亮、刘彧、王俭、沈约、丘灵鞠诸人,据《晋书·荀勖传》、《晋书·挚虞传》、《宋书·傅亮传》、《宋书·明帝纪》、《南齐书·王俭传》、《梁书·沈约传》、《南齐书·丘灵鞠传》载,都有任职秘书监或典校图籍工作的经历。

章学诚称“《诗品》深从六艺溯流别也”,“其法出于刘向父子”云云。《南齐书·王俭传》称王俭“依《七略》撰《七志》”,那么,从刘向父子到王俭,从王俭到钟嵘,应该是一脉相承的。《隋书·经籍一》称刘向校书,“每一书就,向辄撰为一录,论其指归,辨其讹谬,叙而奏之”;又称王俭《七志》,“然亦不述作者之意,但于书名之下,每立一传,而又作九篇条例,编乎首卷之中”<sup>③</sup>。从《诗品》的编纂体例看,钟嵘确实是对每家诗作有所评价,也是对每家诗作“论其指归,辨其讹谬”的。论者称钟嵘《诗品》多针砭诗歌创作之时弊,这也是继承了刘向父子的传统。余嘉锡曰:“按《汉书·刘向传》言‘上方精于《诗》、《书》,观古文,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’,故向所作叙录,多因事纳忠。如《战国策》录云‘亦可喜,皆可观’,《孙卿新书》录云‘其书比于记传,可以为法’,《说苑》录亦云‘皆可观’。其意皆欲成帝观之以法戒,即其作《列女传》以戒天子之意。”<sup>④</sup>《诗品》也确实有“条例”,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《序》。

### 三、《诗品》未著录于“簿录篇”与作者标榜目录学的心理动因

钟嵘《诗品》的性质有类于《文章志》,而“簿录篇”著录《文章志》一类书,那么《诗品》为什么未著录于“簿录篇”?《隋书·经籍四》“总集”类所著录者:“《文章流别集》四十一卷(梁六十卷,志二卷,论二卷,挚虞撰)、《文章流别志》、《论》二卷(挚虞撰)……《西府新文》十一卷(并录,梁萧淑撰)、《百国诗》四十三卷、《文林馆诗府》八卷(后齐文林馆作)、《诗评》三卷(钟嵘撰,或曰《诗品》)、《古乐府》八卷……”<sup>⑤</sup>其中视钟嵘之作为《诗评》,则此书为“总集”或“总集”之附庸,也是说得通的。挚虞《文章流别志》不也著录于此“总集”类吗?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则著录此类书于“集部”的“诗文评”。但我们还应该注意到《隋书·经籍四》“总集”类在著录“《诗评》三卷”时的小注:“或曰《诗品》。”于是我们要问,称钟嵘撰作为《诗品》,此书应该著录在何处?那就应该著录在“簿录篇”。《隋书·经籍二》的“簿录篇”著录各种《文章志》,又著录:“《书品》二卷、《名手画录》一卷、《正流论》一卷。”<sup>⑥</sup>这属于“簿录篇”著录的最后三种书,《名手画录》应该是“画”的目录,《书品》应该是以“品”的方式排列的“书法”目录。“簿录篇”所著录“《书品》”之类,应该是与《诗品》同类的。进而我们要问,“簿录篇”著录与《诗品》性质相同的《书品》二卷,为什么《书品》入“簿录篇”,而《诗品》不入?

章学诚《校雠通义·互著第三》云:“古人著录,不徒为甲乙部次计。如徒为甲乙部次计,则一掌故令史足矣,何用父子世业,阅年二纪,仅乃卒業乎?盖部次流别,申明大道,叙列九流百氏之学,使之绳贯珠联,无少缺逸,欲人即类求书,因书究学。至理有互通、书有两用者,未尝不兼收并载,初不以重复为嫌;其于甲乙部次之下,但加互注,以便稽检而已。古人最重家学。叙列一家之书,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,无不穷源至委,竟别其流,所谓著作之标准,群言之折衷也。如避重复而不载,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录,于本书之体,既有所不全;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,于一家之学,亦有所不备矣。”<sup>⑦</sup>如果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严格执行“互著”体例,那么钟嵘之作除著录于“总集”外,还应该著录于“簿录篇”。但《隋书·经籍志》“总集”类著录《诗评》时又注明钟嵘撰者“或曰《诗品》”,实际上已提供给读者另一信息,即作为《诗品》,它还应当属“史部”的“簿录篇”。于是我们说,在钟嵘撰作《诗品》或称《诗评》的年代,该书还有目录书的性质,



还有来自目录学的渊源。综合而言,钟嵘的著作,称之为《诗评》,则为总集类,是对诸多五言诗的评述,以作阅读欣赏;称之为《诗品》,则为簿录类,是对所著录诗人五言诗区分品级的评述。

钟嵘《诗品序》对前辈文论有评云:“陆机《文赋》,通而无贬;李充《翰林》,疏而不切;王微《鸿宝》,密而无裁;颜延论文,精而难晓;挚虞《文志》,详而博赡,颇曰知言。观斯数家,皆就谈文体,而不显优劣。至于谢客集诗,逢诗辄取;张隐《文士》,逢文即书。诸英志录,并义在文,曾无品第。”<sup>①</sup>钟嵘认为此前文学批评的缺点在于“不显优劣”、“曾无品第”。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批评?这主要是因为文学批评之难,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曾这样说:“文人相轻,自古而然。傅毅之于班固,伯仲之间耳,而固小之,与弟超书曰:‘武仲以能属文,为兰台令史,下笔不能自休。夫人善于自见,而文非一体,鲜能备善,是以各以所长,相轻所短。’里语曰:‘家有敝帚,享之千金。’斯不自见之患也。今之文人……斯七子者,于学无所遗,于辞无所假,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,仰齐足而并驰,以此相服,亦良难矣。”<sup>②</sup>“文人相轻”,一个文人批评另一个文人是困难的,也是不容易得到认可的。曹植在《与杨德祖书》中曾提出某种对待作品的态度:“人各有好尚,兰茝荪蕙之芳,众人所好,而海畔有逐臭之夫;《咸池》、《六茎》之发,众人所共乐,而墨翟有非之之论,岂可同哉?”<sup>③</sup>这样也就是钟嵘《诗品序》所说的“观王公搢绅之士,每博论之余,何尝不以诗为口实。随其嗜欲,商榷不同,淄渑并泛,朱紫相夺,喧议竞起,准的无依。”<sup>④</sup>

怎样克服或防止“随其嗜欲,商榷不同”之类问题?钟嵘的办法就是文学批评学术化,以目录学的方法来作文学批评。传统目录学认为,之所以要对书籍讲究编排组织,条别其异同,主要是为了辨明不同的学术流派,理清它们的源流发展。所以郑樵《通志·校讎略》说:“学之不专者,为书之不明也;书之不明者,为类例之不分也;有专门之书,则有专门之学。”<sup>⑤</sup>现在钟嵘把诗人分成流派,理清其源流发展,分品评论,就是期望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文学批评。

①⑥⑦②②②②③③ 《隋书》,中华书局1973年版,第1084页,第991页,第992页,第905页,第906—907页,第907页,第1084—1085页,第991页。

② 《梁书》,中华书局1973年版,第694页。

③⑤② 《南史》,中华书局1975年版,第1779页,第1778页,第1489页。

④⑧ 叶瑛:《文史通义校注》,中华书局1985年版,第559页,第685页。

⑤①③②②③③⑦ 曹旭:《诗品集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,第186页,第161—162页,第66页,第192页,第428页,第186页,第62页。

⑨ 刘师培:《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,第114页。

⑩①②④⑤ 余嘉锡:《世说新语笺疏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,第245页,第261页,第261页,第275页,第369页。

⑬③③ 萧统编、李善注《文选》,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刻本,第179页,第720页,第594页。

⑰ 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1962年版,第1701页。

⑱ 杨明:《文赋诗品译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,第42页。

⑳③ 章学诚:《校讎通义》《章学诚遗书》,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,第95页,第96页。

㉑③ 余嘉锡:《目录学发微》,巴蜀书社1991年版,第2页,第22页。

㉒ 《南齐书》,中华书局1972年版,第433—436页。

㉓ 郑樵:《通志》,中华书局1995年版,第1804页。

(作者单位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)

责任编辑 山木